

收稿日期:2025-12-12

##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 《我的阿勒泰》的自然伦理观研究

李霞

(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我的阿勒泰》以影像的方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思考,建构了新的自然伦理观。该剧通过对自然景观的诗意化镜头表达和人与自然的互动,重构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和主体性特征的自然伦理观,超越了传统将自然视为活动背景或象征手段的工具性思维。哈萨克族将自然视为传统文化的承载体,他们的游牧生态实践都与生态女性主义“整体性”认识论、“关怀伦理”原则高度契合,打破了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作品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呈现了草原生态文化与城市理性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传达了重建新的生态伦理价值体系对于解决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等关系问题的重要性。该剧从重构自然伦理观的视角对工具理性和二元对立的文化进行反思与替代,与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这种替代方案植根于前现代社会背景,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回望。

**关键词:**《我的阿勒泰》;生态女性主义;自然伦理观;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2-0090-11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算法传播与数字时代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型研究”(23YJA751019)。

**作者简介:**李霞(1976—),女,江苏赣榆人,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视觉文化和艺术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2.010

1974年,弗朗索瓦兹·奥波尼(Francoise d' E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逐渐拓展至文学批评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批评范式,并在持续演进中分化出多个理论分支和研究路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文化是几千年来对女性和自然实施压迫的直接源头,试图从性别和生态融合的视角解构父权制文化。随着生态危机日益严峻以及女性主义思潮研究的不断深化,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术界开始引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并在文学和社会学领域引发广泛关注。国内文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译介和阐释,二是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对一些艺术作品进行解读,尤以后者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这类研究多集中于分析作品中女性形象建构或女性意识的阐释,而对艺术作品中自然的呈现与表达以及自然与人物的互动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的阿勒泰》以中国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为叙事背景,以女主人公李文秀的视

角展开叙述,在展现壮美辽阔与柔和秀丽并存的自然风光的同时,真实再现了哈萨克族游牧生活的质朴与诗意。该剧以自然景观为重要视觉与情感载体,构建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图景,其鲜活的人物形象及人与自然的互动,不仅承载了浓厚的人文关怀,也蕴含着对自然伦理的深刻思考。基于此,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我的阿勒泰》进行分析,揭示该剧在自然伦理及人与自然的互动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在人类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科技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对思考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表达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与理论指导意义。

## 一、影像的自然观:《我的阿勒泰》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同构性书写

### (一) 自然作为主体的伦理观表达

在过去的许多影视剧中,自然承担的作用不外乎两个方面,或为人物活动的场地,或为凸显人物形象的象征性手段<sup>[1]</sup>。自然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叙事框架下的必然结果;自然一直被视为人类意志的背景或工具,被人类所左右,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随着国内影视剧不断拓展审美边界,施鸽指出,近年的影视剧中自然空间具有多重审美意蕴,成为推动女性觉醒和性别话语重组的重要叙事要素,“自然空间不仅映射着女性的生存处境与情感轨迹,更承载了她们通往自我认知与情感复归的内在路径”<sup>[2]</sup>。该文同时指出,近年影视剧建构了两种独特而鲜明的自然空间,并对女性人物的内在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是富饶、自由、平和的理想型空间,另一个是资源贫瘠的压迫性自然空间。前者给女性精神抚慰,后者使生命更加坚韧。

《我的阿勒泰》一剧中的自然,应属于前者。它不仅具备了上述指称的所有功能,还重塑了新的自然伦理观。确切地说,该剧通过对自然景观的诗意化镜头表达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互动场景,赋予自然以生命力与能动性,突显了自然作为具有内在价值与道德地位的主体形象。在审美呈现与叙事结构中重构了一种具有主体性特征的自然伦理观。这一表现超越了传统将自然视为活动背景或象征性资源的工具理性逻辑,展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去中心化、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

首先,在影像表达层面,自然空间不再被动地成为人物活动背景或审美装饰,而是以具有主体性的姿态深度嵌入叙事之中。阿勒泰的自然山水以其占据前所未有的画幅比例和叙事比例,在荧屏的空间和时间中都成为前景式的存在<sup>[3]</sup>。比如李文秀刚到夏牧场时,镜头从她紧张的背影慢慢拉开,最后她的身影完全被草原淹没。这样的画面设计,不是为了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想象,而是用空间压迫感传递一个事实:自然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不因人类的存在而改变。另外,本剧中的动物被赋予了与人类角色同等的叙事地位:骆驼缓步行走、牛羊成群移动、骏马自由奔跑的画面常常脱离主线情节,形成独立而富有节奏感的影像段落。例如,在“狼群追逐李文秀”这一片段中,导演并未通过紧促的剪辑营造惊悚氛围,而是采用长镜头跟拍狼群奔跑的姿态,让观众体验生命蓬勃自由的律动。正是通过这些镜头,一种不为人类意志所支配的生命自由与和谐活泼的美,即自然本身的“自在之美”,得以淋漓展现。

其次,剧中人物对自然的认知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行为,彰显出对自然内在主体性价值的认可。李文秀和其母张凤侠有一段关于人的“有用性”的对话。张凤侠说:“啥叫有用?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吗?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呀、草呀,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她的观点,反对用人类的尺度去衡量自然的存在价值,否定了功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看待世界的方式,主张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

和自足性,用一种平等的视角去理解和对待自然,凸显出自然本身的主体性价值。

不仅如此,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哈萨克族人平等地对待自然中的其他生命。他们将牛羊马视为朋友,并不视为财产。当马死后,他们会将马的头颅割掉挂在每天必路过的大树上,以示思念和尊重。当亲人死了,比如木拉提因醉酒冻死在路边,在其葬礼上,巴太等人并没有表现出类似于汉族葬礼上常出现的声嘶力竭的痛哭,而是默哀和祈祷、立个墓碑以示纪念。也许,在哈萨克族人看来,人类生命和天地万物一样,仅仅是生命的一种呈现样式,因为在他们的神话传说中,白天鹅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阿尔金山和苏干湖则是由一位少年和两姊妹化成,哈萨克族人的生命诞生于自然,最终也会回归自然。

总之,《我的阿勒泰》在自然呈现上相较以往艺术作品实现了巨大的突破。自然不再是仅用于衬托人物活动、象征人类品性的背景装置,而是以具有内在生命力和主体性价值的形象进入叙事结构,展现出其独立于人类尺度之外的存在意义。

## (二) 游牧民族生态观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同构性表达

《我的阿勒泰》所呈现出注重自然内在生命力和主体性价值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自然伦理主张:“关怀伦理”原则、“整体性”认识论与“有机”自然观。这些主张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也折射出生态女性主义试图颠覆父权制文化和二元对立思维的底层逻辑。

首先,哈萨克族人尊重自然,将人的生命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平等地对待自然中的各类生物,这种自然伦理观与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关怀伦理”原则相呼应。“关怀伦理”是对应于父权制文化下的“正义伦理”而提出的。“传统父权制文化制度下的正义伦理支持抽象的个体论,在认识世界方面是‘自我-他者’式的,使用的是强权和强者主宰的秩序话语”<sup>[4]</sup>。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认为,“过去的伦理只关注正义和权利,贬低关爱与责任,剥夺了女性的独立性,否定了女性气质的优越性”<sup>[5]</sup>,妇女倾向于以关心和责任界定自我,而男人以个人成就界定自我。关怀伦理提倡从女性视角建立人与自然的关联,强调关怀、爱、责任与和平,意在改变传统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形成以感性关怀为基础的逻辑系统,是对男性“正义伦理”原则的补充。它是生态女性主义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者关系的重要策略,是从实践上开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路径。

尊重自然,关怀其他生物体,此类充满诗意的自然观在影片《阿凡达》的开篇也曾短暂闪现,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潘多拉星球原住民纳威人敬畏自然,相信万物有灵,所有亡故的生命都会回归圣母伊娃的怀抱。原住民“与天地万物之间建立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模式,而是互惠互利的和谐共生模式。他们将各种自然生命纳入伦理观照的范畴,把对人的关怀扩展到对所有生命的关怀”<sup>[6]</sup>。纳威人关心环境,承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而不是将自然视为被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可惜的是,电影并未进一步探讨如何维系这一生态关系,或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策略。相反,随着情节推进,潘多拉星球最终仍陷入了一场以高科技与重型武器为主导的暴力对抗之中,回归了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理性支配下的传统叙事逻辑,从而削弱了其对生态伦理的真正践行。

而在《我的阿勒泰》中,女主人公对自然的认知经历了从感性体验到理性理解再到亲身实践的逐步深化过程。她在意识层面完成了自我与自然关系的重构,行为上展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体贴。她与自然之间所建立的亲密、平等、持续的互动关系,生动诠释了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关怀伦理”在现实情境中的具体实践与文化转化。剧中,女主李文秀对自然的态度和认知不断地发生改变。开始,她嫌弃羊粪、躲避着牛羊,表现出源于城市生活的疏离感与排斥态度;到后

来光脚走过草地、躺在草地上睡觉、与骆驼亲密接触,表现出她在感官和心理层面开始接纳自然;到最后她骑着“踏雪”与破坏阿勒泰草原生态的恶人对抗,完成了由被动体验者向主动守护者的身份转变。这一历程清晰展现了关怀伦理的内在逻辑链条——从身体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出发,生成情感纽带,进而形成伦理自觉,最终落实为捍卫自然的具体行动。

其次,哈萨克族所秉持的“万物有灵”的观念、将自然与传统融合为一的认知以及他们实行的轮牧与休牧的实践智慧,都与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的“整体性”思维和“有机”的生态观形成深刻的呼应。

凯伦·沃伦在《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中认为:“砍伐森林,污染农业、水、粮食生产以及有害废物的排放,适当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环境,必须要了解女性、下层阶级、有色人种、非西方国家等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困境。”<sup>[7]</sup>这里,生态女性主义将环境问题、女性问题、种族问题以及边缘群体的遭遇放在一起讨论,用一种交叠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女性被压迫问题,从一种更综合和宏观的视角来反思各类不平等与压迫。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各种社会压迫形式之间相互关联。“女性必须明白,在一个基本关系模式仍然是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中,女性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生态危机也不可能得到解决。”<sup>[8]</sup>生态女性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文化是导致女性和自然被压迫的根本原因。

传统父权制文化通过构建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如女性/男性、自然/文化、感性/理性、原始/科学、传统/现代等,前者被视为低于后者的存在,象征着“他者性”“落后性”与“非理性”,而后者则被赋予主导地位,象征“中心性”“先进性”与“理性”。在父权制文化中,这种价值等级内化为社会运行和评价事物的机制,支配着人类所有的意识和行动。

鉴于此,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用一种女性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和自然问题,用一种“整体性”思维代替将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对立的思维,主张“用弱势群体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批判社会问题,并提出新的重建方案来改变日益严重的问题和危机”<sup>[9]</sup>。生态女性主义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人脱胎于自然,是大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本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生物性的存在是文化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文化是建立在生命基础之上的,必须从生命出发来加以理解,而不能将其视为完全脱离自然维度的独立实体。”<sup>[10]</sup>同时,提出一种“整体性”认识论来反对父权文化中将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对立的父权文化逻辑。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曾指出:“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生存的关键是系统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性和相互依存关系,以维持生态多样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循环与人类循环在这个整体中结成一体。”<sup>[11]</sup>麦茜特认为,自然界中各系统的生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赖,人的行动亦在这系统中存在,与系统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具体而言,从激进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自然作为一个单一且统一有生命的物质/物理世界并不存在。相反,存在着由各种文化制度建构出来的不同类型的‘自然’——或称为‘多重自然’”<sup>[12]</sup>。一方面,不存在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自然,自然已被打上人类的烙印。另一方面,人类建构的各种文化制度是在和自然的作用过程中完成的,已经打上了自然的烙印。自然和人类是一个相互依存、交织共生的整体;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文化系统是相互作用,凝结在一起的,二者不可分离。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父权制文化中将人与自然、理性与感性、文化与自然之间进行隔离和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强调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共构关系。自然中蕴含着文化,文化中包含着自然的痕迹。

这一点,在哈萨克游牧文化中得以证实。他们认为,自然和传统文化并非两个对立的事物,而是合二为一的。自然不只是生活的地方,还是保存文化记忆的载体,尊重自然意味着尊重传统。例如,剧中主线哈萨克族转场迁徙,它不仅是给自然修养生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更是对过去族群生活方式的怀念和传承。剧中张凤侠坚持走危险的仙女湾小路,她说:

“这条路留着祖先的气息。”他们普遍以平等、敬畏的态度对待自然,将自然视为文化记忆的载体与情感传承的空间,使自然与文化之间呈现深度融合与共生的关系。这种“把自然当作有灵魂、有历史的存在来对待”的态度,本质上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整体性”思维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一种在地化实践形态。哈萨克牧民的认知和实践方式颠覆了“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逻辑,突破了传统以人为中心的自然观,重构了将文化置于自然之上的等级价值体系,颠覆了工具理性和父权制文化。

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整体性”认识论对传统的认知和思维构成一种挑战,“向我们敞开了我们认识什么的多种可能性,它诉诸我们体内的多种认知能力,这些能力无法被简化为单一的理性话语方式”<sup>[10]</sup>。它为构建一种新型的建立在共情、关怀基础上的“人-自然”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正是在此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提出有机论自然观来代替过去的机械论自然观。

有别于现代技术理性对自然的机械化、碎片化理解,有机论自然观强调自然是一个内在关联、具有自组织能力和道德地位的生命整体,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应是和谐共存的关系。更不能因人的贪欲,非理性地过度开发和破坏自然。生态女性主义提倡人类应该“以生存必需为视角,消除所有威胁地球的实践和制度,极力倡导人们过一种尽可能简单的生活”<sup>[13]</sup>,倡导适度发展观。

哈萨克族长期在草原上生活,他们放牧牛羊,逐草而居。在与自然的长期接触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然观,“万物有灵”的观念深深根植于牧民的脑海里。在他们的认知中,哈萨克族人的生命诞生于自然,最终也会回归自然。“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切元素——无论是人、动物、植物还是自然现象——都怀有深深的尊重。他们深信这些元素都承载着生命和灵魂,共同构成了一个神秘而富有活力的自然。”<sup>[14]</sup>基于这种观念,他们不再将草原单纯地视为被利用的资源或者单纯的景观,而是以尊重、平等、非支配性的态度对待自然界的万物生命,将自然视为有灵性的共同体成员,而非可被无节制开发与征服的对象。他们不会将牛羊骆驼视为自身的财物,而是视为人类的朋友。

再有,为了保障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哈萨克牧民长期实行轮牧与休牧制度,使草原获得周期性休养与恢复,从而有效维护了水草丰茂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达成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动态平衡。哈萨克族依循自然节律迁徙、顺应季节更替的生活方式,正是对自然节奏的尊重与适应。他们不主张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是通过与自然保持同步的节奏,维系生态的和谐秩序。这种有机性的生态智慧,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力图复兴和建构的一种世界观与生活实践。

哈萨克族的自然观为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种具有地方性智慧的新视角。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态实践与生态女性主义“整体性”认识论、“关怀伦理”、有机自然观高度契合。他们将自然视为自身文化记忆的延续者、精神情感的共鸣体,与其建立起一种亲密且富有伦理责任感的互动关系。因此,哈萨克族的自然观不仅是对本民族生态经验的实践表达,更与生态女性主义在全球层面的理论诉求形成了有力的对话。这一自然观的存在与实践,为反思并重构父权制文化语境下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构成了一次兼具地方文化底蕴与普遍价值意义的探索与尝试。

## 二、“自然”与人物的互构:草原与城市两种生态文化的对比

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倡导的“整体性”认识论和“关怀伦理”所主张的,用一种新的视角和价值标准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他者的关系。哈萨克族的自然伦理观不仅建构了人与自然的新关

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塑造了人与他者的社会伦理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亦有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sup>[15]</sup>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为人类生存提供基本资源,同时也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对象。人通过创造工具与改造自然,使自然演变为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身体与自然成为“统一的生命体”。这里,马克思明确了人如何通过实践把自然“对象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实现了人的本质。但他也暗示了,人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自然也通过其提供的空间、资源、节律等方面影响和塑造人类。“自然”为人类提供生活环境和生存资料,对人类的生产方式、文化思维、行为方式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列斐伏尔曾说,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sup>[16]</sup>,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草原与城市作为两种迥异的生存空间,承载着不同的运行逻辑,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们的意识与行为,从而建构各自独特的性别秩序。城市是工具理性和现代科技文明的产物,工具理性和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是城市运行的内在逻辑。而阿勒泰草原则远离工具理性,以更具爱和包容、情感和理性兼容为特点的多元化价值观构建人际生态。在《我的阿勒泰》中,草原与城市不仅构成了人物赖以生存的物理空间,更是两种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象征,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剧中人物的价值取向与行事逻辑。来自两种生活背景的人物相遇,产生碰撞与纠葛,生动呈现了生存空间对个体思维模式与行为选择的深层影响,并由此构成了两种迥异的文化生态之间的鲜明对比。

#### (一) 李文秀:自然的治愈与觉醒者

故事伊始,李文秀怀揣作家的梦想,在乌鲁木齐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工作之余,经常用笔记生活,她认为大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定会让她成长为一名作家。她的行为,与大城市快速赚钱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显得浪漫而脱离实际。同事嘲笑她、欺侮她,她选择忍气吞声和逃离。当她要离职的时候,看见高晓亮私吞了自己200元的遣散费,虽感到气愤但不敢声张。这时候的文秀,是个胆小懦弱的女孩,脆弱得连自己都无法保护。

工具理性是城市运行的内在逻辑,它高扬理性和技术,贬低感性和自然。在工具理性主导下,人类行为日益以效率与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社会关系趋于功利化与目的化,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性被削弱,竞争性则不断加剧,最终导致人际关系异化与社会生态的失衡。城市建构的人际生态就是这样的冷漠无情,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一切都以利益作为考量的标准。文秀的同事,要么就是嫉妒心强、没有任何同情心的人,要么就是市侩逐利、投机取巧之人。即使她以一颗友善之心对待周围,也未收到丝毫的温情和公正。李文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倍感压抑和憋屈。

文秀回到阿勒泰后,辅助母亲经营小卖部,在与当地牧民的接触中,感受到周围人的温情与善良,并逐渐走向勇敢而成熟。在要账这件事上,即使牧民们没有现金,也会用牲口相抵,让她感受到牧民的诚实守信,与城里人自私狡诈的个性相反。在澡堂洗澡这一环节,李文秀看到的是女人之间的真诚与互助。剧中有个细节镜头,呈现文秀瞪大着眼睛看着这一切。在城里,女性之间往往因竞争而冷漠疏离、甚至互害;而在阿勒泰,文秀和托肯一起洗衣服、库兰慷慨借出裙装让她盛装出席婚宴,这些事情让她体会到草原女性之间的无私友爱和互相扶持的美好。更有,与巴太恋爱,巴太对她的肯定和尊重,让她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让她重拾自信,学会了表达爱和承担责任。这些情感体验为她的写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她明确了人生方向并坚定地走下去。在阿勒泰,草原上爱与包容的和谐氛围治愈了受伤的文秀,给她前行的力量和勇气。即使在故事结尾,她出走阿勒泰来到北京等大城市赚钱并体验生活,最终还是选择回归阿勒泰继续写作。这时候的文秀,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坚韧自信、勇敢担当、富有激情又兼有创意的

女孩。

李文秀的觉醒与成长,根本上得益于阿勒泰草原文化的滋养。草原的人际生态以信任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真诚直率、互帮互助,没有精心计算的利益权衡。这种社会氛围有效消解了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工具理性价值观,并以友善、宽容以及尊重个体自由发展的多元价值体系取而代之。在这一充满人情温度的空间中,李文秀不仅获得了情感上的归属感,也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与位置,从而实现了深层次的自我转变。作为一种远离都市父权逻辑与理性中心主义的自然空间,草原为个体提供了更多“回归本真”的可能性。其辽阔、自由与非功利性,不仅帮助李文秀摆脱了都市焦虑,更成为促成其主体性觉醒的关键环境条件。

与之对照的是,剧中另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同样拥有写作天赋的女性,她的写作梦想却被照顾孩子和家务淹没了。与困于都市的主妇相比,自然赋予李文秀的不仅是场域间的转移。那位主妇的手稿,只能停留在丈夫孩子睡着后的后半夜;李文秀的笔尖却随着迁徙的羊群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当主妇被禁锢在四面白墙内重复家庭劳动时,李文秀却在夏日篝火跃动的光影中写下“去爱、去生活、去受伤”的生命宣言。这种对比显示出城市与草原对女性成长的影响:草原社会的生存状态打破了城市中“男性主外、女性主内”的二元对立结构,在放牧、迁徙、狩猎与家庭生活中,男女都承担起维系群体生存的角色,牧场的辽阔性使性别规训没有那么严苛。

总之,李文秀由一个内心迷茫、缺乏自我认可的少女,转变为一个坚韧自信而又有担当的作家;由一个被城市文化规训的失败者,经过阿勒泰的生活,最终变成草原生活的记录者。女主人公主体性的建构过程,是两种文化生态的对比过程,这一切都凸显了草原所建构的多元化价值的力量,从而从另一个角度变相地否定了城市所建构的理性功利主义文化。自然,才是灵魂和生命的真正滋养者。

## (二) 张凤侠:自然与人的灵性沟通者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强调,女性与自然在父权制社会中共同承受着压迫与异化,而女性对自然的感知往往更具敏感性与实践性。《我的阿勒泰》通过张凤侠一角的塑造,以独特的叙事策略展现了女性与自然的深层联结。

张凤侠的形象集中体现了女性与自然的“灵性互通”。她是从内地搬到新疆的汉族女性,开小卖部,做牧民生意,和他们处成朋友。虽然不会说哈萨克语,但听得懂哈萨克语,她能和当地人无障碍交流。她好像具备掌握语言的超能力,显得很神奇。但当高晓亮出现后,她的这一超能力却消失了。这前后的变化,连她自己也未清楚原因。

该剧情看似玄乎,让人难以置信,但运用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些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它。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分支认为,女性身体天然地和自然具有相似性,如女性月经周期和月亮周期吻合,女性孕育生命和自然供养人类相似,这容易使二者形成亲密的“感应”关系。基于此,女性与自然天然地有着灵性沟通的可能。这种说法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是她进一步固化了女性与自然的固有属性,加深了两性之间的刻板印象。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张凤侠的语言事件,有些牵强附会。

物质生态女性主义反对“性别本质化”的观点,以量子力学理论为基础,认为物质并非相互分离、各自独立的物质个体,而是没有固定边界、具有量子波的相互影响的个体。物质世界的各个动能体在能量的相互激发和震荡中产生密切联系。物质女性主义代表史黛西·阿来莫提出跨体性,即人类身体不是封闭系统,而是与环境物质流动相通的界面<sup>[17]</sup>。

按照物质女性主义观点,人与自然(包括他者)之间的联系,不仅可以通过语言进行理性建构,也可以通过身体、情感、劳动等层面建立起来。张凤侠之所以能听懂哈萨克语,在于她与草

原牧民共同生活劳动建立的身体性实践的感知力,这是一种“身体嵌入环境”的能力,是对生态和他者的深度理解和感知,而非抽象认知。而高晓亮的到来,象征着城市秩序、男性主导的文化理性的回归,他的到来,让张凤侠重新回到“规范”化的文化框架中。她由一个与草原共生的参与者,变为一个被理性系统重新定义的观察者和审视者。她失去听懂语言的能力,并非生理退化,而是她与自然及他者的物质联系和情感联系被割裂了。

高晓亮不断劝说张凤侠返回城市发展,强调城市的前途与“现代化”优势,同时贬低阿勒泰的“落后”与“原始”,张凤侠开始动摇对草原生活的情感认同与生态归属。在视觉表达上,镜头多次采用封闭帐篷、切断远景的构图手法,象征她与辽阔自然之间的感知通道逐渐被阻断。这种构图不仅暗示了她内在心理的挣扎与动摇,也形象呈现了她与自然联结的断裂过程,标志着她从“草原嵌入者”向“城市认同者”的身份转变。

另外,关于张凤侠语言事件,用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整体性”思维亦可以合理解释。在“整体性”认识论看来,“知识首先不是一种理性的描述,而是一种经验;而经验并不总是能够被转化为语言或理性的命题。这种经验以人与地球以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的理解为出发点时,它呈现出一种被关系性所标记的全新认知方式。在这种认识论中,人类的存在展现出其与被认为是非人类存在之间惊人的联系与依赖关系”<sup>[10]</sup>。这句话指出,知识的本质并非仅仅建立在逻辑与抽象思维之上,更源于一种与世界直接交汇的生命体验。当这种经验以人类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作为起点时,人类不再被视为孤立的理性主体,而是与众多被视为“非人类存在”的事物之间,维系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依存。这种经验性的知识,是一种通过身体感官、情绪体验、理性与非理性交织而成的整体感知,是人类用生命去感受世界、理解现实的综合性认知成果。张凤侠因其自身长期与牧民生活,她的身体、理性与感性的各类器官,已经与牧民的世界相交融,已超越了理性思维所禁锢的场域。

张凤侠在丈夫死后,独自带着女儿和痴傻的婆婆生活,没有被生活压垮。随着情节的开展,张凤侠重感性的一面逐渐展现出来。她经营小卖部,牧民欠账三四千,但并没有及时讨要。这说明她是一个善良宽厚且具有高度同理心的人,她与牧民的相处超越了现代人之间的功利与算计。她在转去夏牧场的时候,选择路远而风景优美的仙女湾的小道,放弃了直接便利的大道。不仅因为仙女湾是她和死去的丈夫相识的地方,以示怀念;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她对生活的态度,不盲目追求生活的效率和实用,过着车马缓慢的诗意生活。她不为“最快、最有效”的这一城市文化功利标准所左右,而是坚持自己的生活态度:缓慢和重体验。这种审美化的生活态度,是一个女性在用她的身体、感性和思想,在维系着人与自然之间那种细腻和非理性的情感连接,展现出一个女性如何在现实压迫间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化的生活方式的尝试。

综上所述,张凤侠虽然未曾系统学习哈萨克语,却能够与牧民实现有效沟通,这种跨越语言障碍的交流能力,源于她对草原生活的深度参与以及对自然环境的身体性嵌入。她舍弃了现代社会中以效率、利益与金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选择以一种开放而真诚的姿态,将自己的身体与情感毫无保留地投射于草原之中,与自然、与牧民建立起真实而深厚的关系,展现出一种恣意洒脱、自由舒展的生命状态。这一行为方式,是对构成父权文化中“理性/感性”二元对立结构的有力颠覆。在张凤侠的身上,感性不再是被压抑的“他者”,而是成为通向自然、理解他者的核心能力。她通过身体的实践嵌入,在阿勒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构建起一种基于经验、情感与直觉的生态认知方式。这种感性经验不仅打破了由理性语言建构的交流壁垒,也质疑了理性至上、逻辑优先的文化权力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张凤侠对他人的宽容态度与她对自然的审美性体验,共同指向了一种超越功利、以关系性为核心的生态伦理观。这种伦理实践不仅为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具体样态,也为当代人类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人与他者关系的

可能路径。

### (三) 高晓亮:城市生态文化的践行者

《我的阿勒泰》既塑造了能与自然融洽相处、重感性和重人情的张凤侠,同时也塑造了一个与之截然对立的人物——高晓亮。他是现代城市生态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的行为和价值观与张凤侠根本对立,剧情在展现他们两者的亲密互动中揭示出二人不可调和的冲突。高晓亮是一个城市外来客,他在大城市赚了钱后想去戈壁滩寻找一夜暴富的机会,因被同行算计,差点命丧戈壁滩。在被张凤侠救下之后,成为她的男友。他与张的价值观冲突从此展开。通过对比,两种对待自然、对待生活的态度呈现鲜明的差异。

高在第一次吃到新鲜的木耳时,想到的是如何将木耳晒干拿去出售换钱。他吃完饭就去采摘并打理木耳。一次,大雨来前,他急着将木耳装袋以免淋湿,张凤侠却喊他去河边喝啤酒。张的需求是享受生活和浪漫;而高是现实的,更重视金钱利益。同样地,面对选择定情纪念物时,张选择将两个废弃的子弹壳打造成吊坠以纪念二人的相识,而高则认为等赚到钱以后,金项链才是合适的。在面对别人高额利诱时,高不顾张的劝阻,依然做着冬虫夏草的生意,严重破坏了阿勒泰草原的生态,给牧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他还偷盗奶奶的“绿宝石”,卷跑救命恩人张凤侠的财产,最后对张及其女儿大打出手,想置他们于死地。

为了金钱,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可以践踏任何法律和道德底线。他一直劝张凤侠回上海发展,那里资源富裕、遍地是发财的机会;他贬低草原落后和不便利的生活。他的一切作为,表明他追求金钱效益、社会地位,信奉的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现代资本逻辑。在他身上,赤裸裸地体现着城市文化生态的工具理性和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思维。对张凤侠所信奉的草原上人与人之间所秉持的信任与包容的情感联系不屑一顾,他是一个奉行理性、精于算计的现实主义者,将自然感知和感性经验置于城市、理性思维之下。他以城市、理性进步之名压迫草原的文化和生态系统,轻视并剥削草原世界,是典型的父权制二元文化的践行者,是以理性、科技为圭臬的现代城市生态价值系统入侵草原生态文化的典型代表。他的存在揭示出城市与草原、理性与感性之间深刻的矛盾与张力。他在剧中和张凤侠的生命选择形成对照,以他的言行映照出当代社会在面对自然与人性、效率与生态、发展与尊重之间的深层断裂。

综上,在张凤侠、李文秀与高晓亮三位人物身上,鲜明地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观与人际伦理取向。张凤侠作为草原生态文化的积极践行者,虽为汉族,却自觉认同并融入哈萨克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她尊重当地风俗,以谦和开放的姿态融入当地,能无障碍地和当地人交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她主张欣赏与适度利用,而非出于功利主义目的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掠夺;在与他人相处时,真诚慷慨且不谋私利,体现出超越功利性的浪漫主义态度。她用一个女性的身体实践,构建起一个基于爱与包容、经验与直觉、理性与感性兼容的认知方式和生态伦理观,以对抗工具理性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李文秀则是在草原这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中,逐渐抚平城市生活带来的创伤,实现了个体的疗愈与成长。而与她们形成鲜明对照的高晓亮,则是城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代表。他崇尚理性主义与金钱至上,视自然为资源、视人际关系为工具,体现出强烈的功利化倾向。通过这三位人物的刻画,作品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中两种文化生态系统——草原生态文化与城市理性文化——在自然观与伦理观上的差异,并对如何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之间的和谐关系提出了富有启示性的思考。

## 三、 结语

我国儒家和道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一直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

李慧利指出“天人合一”中的“天”并非指单纯的自然世界。她说：“在儒家道德学说中，‘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之间根本没有明确的区别。实际上‘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两者都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永恒的转化的过程之中。这样说来，在追求社会完善过程中的技术与儒家社会考虑的‘自然’并没有冲突的地方。”<sup>[18]</sup>在这儿，李慧利对天人合一中“天”的内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认为其包含了“社会”内容，有时候为维持“社会”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经常使用一些手段损害自然的利益。她从深层逻辑上指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一直蕴含着功利性和实用主义。其实，这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必然表现。在当代社会中，工具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带来了物质的富足与社会福利的提升，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这一价值逻辑也带来对自然环境的持续破坏。在人类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已呈压倒性优势，其破坏力亦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如何以恰当而合理的方式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时代向我们提出的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我的阿勒泰》以影像化的方式，建构了一种新的伦理自然观。尊重自然、友好平等地对待自然界的其他万物，承认自然的主体性价值。他们不主张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是通过与自然保持同步的节奏，维系生态的和谐秩序。哈萨克族的自然观为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种具有地方性智慧的新视角。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态实践与生态女性主义“整体性”认识论、“关怀伦理”、有机论自然观高度契合，他们将自然视为自身传统记忆的延续者、精神情感的共鸣体，与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密且富有伦理责任感的互动关系。这种自然伦理观，为反思并重构父权制文化语境下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构成了一次兼具地方文化底蕴与普遍价值意义的探索与尝试，与生态女性主义在全球层面的理论诉求形成了有力的对话。

正如生态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应以一种交叠性和宏观的视角来思考人类对自然和女性压迫以及社会其他不公平之间的联系，揭示自然与社会伦理之间潜在的、深层次的联系，追溯其深层根源——父权制文化和二元对立思维。由此，该剧从另一个维度提出了对工具理性价值观的反思与替代方案。该剧通过三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形象地呈现了建立在草原与城市两类空间的文化生态的强大差异。城市文化生态以工具理性主义为核心，强调效率与功利，在人与自然、人与他者的关系中往往造成疏离与伤害；相较之下，草原文化生态则更具包容性，强调互爱与包容、理性与感性、情感与理智二者的平衡，倡导超越功利的友爱互助与多元价值观。这一价值体系不仅有助于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为重构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具温度与韧性的路径，进而化解当代社会中因功利主义与利益至上而导致的人际关系异化。

然而，《我的阿勒泰》所建构的自然伦理观植根于前现代社会背景，与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下语境截然不同。如何在现代语境中构建新的自然伦理与生态价值体系，仍是值得持续探讨的重要课题，该剧所建构的自然伦理观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 参考文献

- [1] 蔡贝琳. 中国电影中的自然建构与伦理观照:基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J]. 名作欣赏, 2024(8): 89-91.
- [2] 施鸽. 大地与“她”:自然空间中女性形象的影像表达[J].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2025(2): 77-84.
- [3] 毛馨儿. 情感重塑与目的地营造:《我的阿勒泰》文旅剧改编实践[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5(1): 124-131.
- [4] 朱晓光.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渊源与流变[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3(12): 98-99.
- [5] 李银河. 女性主义[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13.
- [6] 孟丽花, 杨睿奕. 《阿凡达》系列电影:生态女性主义的悖论式表达[J]. 电影文学, 2024(11): 133-36.
- [7] Warren K J.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21.

- [8] Ruether R R. *New Woman, New Earth: 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an Liberation* [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204.
- [9] 刘丹丹, 韦清琦. 深化与拓展: 走向整体论的生态女性主义[J]. 文化研究, 2020(2):31-42.
- [10] Caro, Vález O C. Ecofeminism: New Liberation Paths for Women and Culture[J]. *Exchange*, 2015, 44(1):64-82.
- [11] Merchant, Carolyn.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Nature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83.
- [12] LI Hueli. Ecofeminism As a Pedagogical Project: Women, Nature, and Education [J]. *Education Theory*, 2007, 57(3):351-368.
- [13] 郑湘萍.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自然与女性[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39-45.
- [14] 丰天月.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我的阿勒泰》[J]. 金钥匙(汉文、蒙古文), 2024(4):35-39.
- [1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52.
- [16]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XXII-XXIII.
- [17] 田径. 女性、身体与物质流动: 论《云雀之歌》之跨体性生态身份建构[J]. 肇庆学院学报, 2023(3):96-102.
- [18] 李慧利. 儒学与生态女权主义[J]. 刘诺亚, 译. 世界哲学, 2004(1):92-98.

## A Study on the View of Natural Ethics in *To the Wonder* from the Ecofeminist Perspective

LI X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71, China)

**Abstract:** *To the Wonder* is a TV series, based on Li Juan's collection of essays, which refl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constructing the new view of natural ethics. The poetic landscape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reveal the intrinsic value and subj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e,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instrumental thinking of considering nature merely as the background or symbolizing tool. The Kazakhs regard nature as a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hose nomadic ecological life resonates with the holistic epistemology and ethics of care in ecological feminism, surpass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The lively characters convey the value difference between pastoral ecological culture and urban rational culture,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reconstructing the new view of ecological ethics for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elf and others. The reflection and substitu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binary opposition echo the theme of ecological feminism. However, this alternative approach is rooted in a pre-modern social context, and is more of a cultural retrospective.

**Key words:** *To the Wonder*; ecofeminism; the view of natural ethics; characters

[责任编辑:朱 根]